

武装冲突中的商业主体： 新的人道议程

雨果·斯利姆*著 / 廖凡**译

摘要

本文旨在对当前所理解的、商业主体在武装冲突中所扮演的各种不同角色作一概述。文章回顾了有关当今内战中的商业与冲突问题的正在扩展的讨论，及其对于人道、人权、公司及和平建设决策者们的重要意义。文章展示了从人道角度对商业企业在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如何超越一些简单且多半是负面的刻板印象，变得更为深刻。文章进而分析了商业主体显著的多样性，这决定着它们对于武装冲突的体验。文章认为，商业企业在武装冲突中有六种可能的角色，即受害者、加害者、供应商、人道行动者、和平建设者和冲突预防者。文章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来改进人道政策，以便人道行动者在法律、商业企业救援和商业企业存续方面同商业企业界进行更为积极和恰当的接触。

关键词：商业企业；武装冲突；人道行动；和平建设；商业企业救援；商业企业存续

* 雨果·斯利姆 (Hugo Slim) 是牛津大学道德、法律与武装冲突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为包括力拓、G4S和英国石油在内的数家公司提供人权与冲突解决方面的咨询意见。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南理所当然地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受到纪念。他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对于人道行动的亲身参与，及其之后对于需要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顿悟，都深深嵌入了现代人道主义的创立史。¹但杜南并非刻意去索尔费里诺创建一个全球人道组织。事实上，他去索尔费里诺是为了生意。他急迫地——或许是绝望地——想要同拿破仑三世会面，取得后者对于一份新的土地特许权的批准。这块土地上有一处瀑布，可以灌溉他在阿尔及利亚饱经干旱的农地。²这也许可以鼓励人道主义者自信地同商人们打交道。毕竟，我们的现代创始人是一名商人，尽管人们都说他不擅此道。³

本文鼓励人道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对于商业主体在武装冲突中的角色和体验作有别于人道机构通常看法的、更为多样化的理解。本章将首先概述过去20年间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商业与武装冲突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的重点是战争经济，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战争原因之一的商业持否定态度。本文进而借助近年来出现的关于商业问题的更为细化的观点指出，认识到商业在冲突社会中的多样性以及商业企业在武装冲突中扮演的六种主要角色，这也许能够使人道政策制定者获益。最后，本文尝试建议人道行动者采取四种方法来更好地同商业企业界打交道，以维护那些在商业企业中工作或者在武装冲突期间依靠商业企业为生的平民居民的利益。

商业企业与战争

商业企业与战争的关系古老而悠久。在人类历史上，通过暴力获取货物与通过贸易获取一样寻常。武装部队经常被用于保护贸易，或者被用于拓展贸易机会和开发新的市场。君主、国家和军阀都需要商业来为战争提供物资

1 See Henry Dunant, *A Memory of Solferino*, originally printed by American Red Cross, 1959, reprinted by ICRC, Geneva, 2009.

2 Caroline Moorehead, *Dunant's Dream: War, Switzerland and the History of the Red Cross*, Harper Collins, London, 1998, pp. 6-7.

3 Francois Bugnion, 'Henry Dunant', in David Forsythe (ed.), *Encyclopedia of Human Rights*, Routledge, 1996, p. 70.

和金钱。当然，由于其所提供的独特的劫掠自由，及其创造出来的战时稀缺商品黑市，战争本身也往往被众多普通士兵首先视为一种商业活动。

在其1827年的著名小说《约婚夫妇》中，曼佐尼描绘了两百年前的三十年战争中向曼图亚进军的瓦伦斯坦劫掠军⁴的行为和动机：

当他们到达选作宿营地的村子后，士兵们很快四散而出，肆意抢掠。能吃喝掉或者搬走的东西瞬间消失，其他东西则统统毁掉。家具变成劈柴，农舍成了马厩……他们搜查房屋的每一处缝隙，推倒墙壁，拆毁建筑，一眼看出花园里新挖过的地方，找到人们藏匿贵重物品之处，或者严刑拷打，让他们自己交待藏在哪里。⁵

曼佐尼的描述适用于人类历史上成千上万场战争中牟取暴利的军事劫掠者。最近的例子是波黑、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和利比亚。

战争对于受人尊敬的合法商业企业而言也可以是个好东西。对人道主义者来说，法国伟人伏尔泰最为知名的是其《老实人》一书中不朽的反战段落，及其毅然决然反对不公审判、酷刑和死刑的人权活动。但除了在艺术和政治上才华横溢外，伏尔泰还是个商业天才。他从青年时代就积累了大量财富，不是靠他的著述和戏剧，而是主要靠他的商业经营。伏尔泰的第一桶金是跟一群学校里的朋友一起挣到的，他们设计出一个公式，赢了巴黎的彩票。他的第二桶金则是靠向法国陆军供应制服挣到的。⁶

伏尔泰是从学者们称之为“战争经济”的东西里合法获利的。按照勒比永的说法，这是“一个生产、动员和分配资源以维持暴力的系统”。⁷它是一个与人道法准则和人道行动实践高度相关的现象。人道法学家需要确保商业主体在战争中的权利和义务，需要理解根据国际人道法，商业企业的行为何时合法、何时非法。根据国际人道法，商业企业在武装冲突中受到保护，

4 瓦伦斯坦是一名军事和商业上均获成功的波西米亚指挥官。他出资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军队，为哈布斯堡皇帝费迪南德二世效力。

5 Alessandro Manzoni, *The Betrothed (I Promessi Sposi)*, Penguin Kindle Edition, translated by Bruce Penman, London, 1983, p. 532.

6 Ian Davidson, *Voltaire in Exile*, Atlantic Books, London, 2004, p. 4.

7 Philippe Le Billon, *Geopolitics of Resource Wars: Resource Dependence, Governance and Violence*, Frank Cass, London, 2005, p. 288.

除非其从事制造武器之类的工作，那将使其成为合法的军事打击目标。⁸但要获得此种保护，它们还不得有直接或者间接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⁹

在近年来的内战中，对于冲突中的商业的质疑正确地超出了战争中的商业行为这一范围，而延伸到商业利益在引发和维持武装冲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研究，来理解各式各样的商业如何驱动和塑造战争的暴力模式。¹⁰该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强化了这一洞见，即商业贪婪同政治不满一样，驱动着当代的许多内战。¹¹换言之，战争的经济性同政治性一样强。

政治主体——政府或者非国家武装团体——的首要目标可能是经济性的，利用暴力和政治来加以实现；也可能是政治性的，利用暴力来拉拢经济，为实现该目标提供必要的资金。交战各方可能想将土地和资源分配给少数精英。或者，在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斗争中，他们可能寻求将自然资源从少数人手中重新分配给多数人。无论是哪种情况，无论是政府军还是游击队，他们最起码都需要给部队提供资金。经济资源从来不是政治竞赛的全部，但它们无疑在很多武装冲突中居于中心地位。例如，联合国曾经计算过，在过去60年间的内战中，有40%同对某种形式的矿产或自然资源的重要争夺有关。¹²钻石和黄金是尤为显著的武装冲突之源，也是非洲数场战争的

8 See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 (ed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I: Rules*, ICRC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ule 8, 'Definition of Military Objectives', pp. 29-34.

9 See ICRC, *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CRC, Geneva, December 2006.

10 See e.g. David Keen, *Useful Enemies: When Waging War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inning Th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ter 2, and *Complex Emergencies*, Polity, Cambridge, 2007, Chapter 2; Philippe Le Billon, *Fueling War: Natural Resources and Armed Conflict*, Routledge, London, 2005. See also the many reports of *Global Witness*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witness.org/news-and-reports> (all links in this paper last visited 20 September 2012).

11 Christopher Cramer, *Civil War is Not a Stupid Thing: Accounting for Violence in Civil Wars*, Hurst, London, 2006; Mats Berdal and David M. Malone (eds), *Greed and Grievance: Economic Agendas in Civil Wars*, Lynne Reiner, Boulder, 2000. See more recently, Paul Collier, Anke Hoeffler, and Dominic Rohner, '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Feasibility and Civil War', May 2008, paper available at: <http://users.ox.ac.uk/~econpc/research/pdfs/BeyondGreedandGrievance.pdf>.

12 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Team for Preventive Action,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Conflict: Guidance Note for Practitioners*, New York, 2010, p. 7.

融资手段。这也促成了业界旨在终结所谓“血腥钻石”、确保黄金“无关冲突”的重大行动。¹³

人道法学家们努力想要发现，一个主要是经济性质的冲突何时演变成真正的武装冲突，何时又仍只是一个针对有组织犯罪的旷日持久的暴力性治安行动。这在一些战争中可能难以分清，例如当前在墨西哥的“毒品战争”。这场国家、公民与有组织犯罪网络之间的斗争死亡率极高，比很多真正的武装冲突还要高。

战争经济的人道意义

战争的经济原理，以及战争与偷盗、征收、重新分配和犯罪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方面的洞见对于政治学而言并不陌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早以来就观察到了与资本主义发展形影不离的原始积累暴力模式。战争一直是一种经济战略和财富积累途径，对于殖民主义暴力来说尤其如此。英帝国主义的响亮口号是“商业商业企业与基督教”。众所周知，世界上第一家现代商业“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20万常备军，用于进行屠杀和对阵战，以至于亚当·斯密广为人知地称其为“血污垄断”。全球见证组织、非洲加拿大伙伴组织和联合国对于钻石和矿产在安哥拉、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开创性研究，揭示了政府和非政府交战各方的商业利益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如何继续对平民使用极端暴力的。¹⁴

取决于冲突的性质以及战斗员的目标和能力，内战中的战争经济有数种形式。¹⁵内勒区分了三种主要的武装冲突经济——掠食型、寄生型和榨

13 关于冲突钻石的“金伯利进程”，详见<http://www.kimberleyprocess.com/>；关于世界黄金理事会的倡议，详见 <http://www.globalwitness.org/news-and-reports>, http://www.gold.org/media/press_releases/archive/2012/03/world_gold_council_unveils_latest_draft_of_conflict_free_gold_standard/。

14 特别是，非洲加拿大伙伴组织和全球见证组织的调查研究带来了联合国的国际政治监督，以及“金伯利进程”——政府、公司和公民社会的一个联合计划——所进行的全行业监控。

15 Achim Wennmann, ‘Conflict Economies’, in Vincent Chetail (e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 A Lexic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9, pp. 74-89.

取型。¹⁶在掠食型经济中，武装分子攻击和劫掠本地区域，无法完全控制领土。寄生型战争经济用暴力控制领土，通过收税、敲诈和接管商业企业来经营，成为一国之内的“影子”经济。而在榨取型冲突经济中，武装部队暴力夺取必要的领土，侵占并控制有利可图的农业和矿业。正如吉米·坎德和戴维·基恩指出的那样，政府军和叛军在内战中都可能会采取这些商业做法——最近的典型例子就是印度尼西亚军队中的军人百万富翁，以及塞拉利昂政府中的“士兵—叛乱分子”（他们照抄叛军的暴力行为，攫取当地的商业机会）。¹⁷批评入侵伊拉克的人会说，在伊拉克政权更迭后授予国际性公司的新的石油、建设和服务合同，正是美国及其盟友从类似的冲突经济中获利的一个明显例子。

基于多种原因，人道行动者对于商业企业在战争中的作用十分敏感：

- 首先，人道主义者意识到，商业利益有能力引发战争并鼓励具有商业掠食性的暴力强人对平民施以暴行，以增加其市场份额。
- 其次，人道主义者需要缓和战争对当地商业企业和家庭财产造成的可怕影响——后者迅速变得无法维持人们的生计。当战争毁掉了人们的农牧或贸易小商业企业，贫困就接踵而至。
- 第三，人道主义者正确地担忧援助商品对当地经济所起作用的两面性——援助有可能会造成某些物品饱和泛滥，或者因为以工资或救济款形式新增现金而加大通货膨胀，从而损害市场。
- 第四，人道主义者很自然地警觉到人道援助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和不当商业激励。暴力团体可能会吸引援助，以便征税、转移或者暴力占有。这样一来，援助就成了冲突的一部分，其存在反而会增加针对需要援助者的暴力行为。这是战争中的人道行动的核心风险，它最为明

16 R. Thomas Naylor, *Wages of Crime: Black Markets, Illegal Finance and the Underworld Econom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2002, pp. 45–47.

17 David Keen, *Useful Enemies*, above note 10, Chapter 2; Jimmy D. Kandeh, 'Ransoming the State: Elite Origins of Subaltern Terror in Sierra Leone', i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6, No. 81, 1999.

显不过地摆在人道政策面前。人道政策的目的是通过积极致力于“不造成损害”或者制定“对冲突敏感”的计划，隔离这些风险。¹⁸

- 最后，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商业企业和包括人道机构在内的其他组织，出现了一大新兴商业部门。私人保安公司和私人军事公司——如士瑞克保全公司、宙斯盾公司和阿可德米公司（前黑水公司）——在规模、覆盖面和盈利性方面的急剧增长，意味着它们现在是武装冲突中一大新的商业部门，并且往往是有武装的商业部门。¹⁹在过去几年中，协商制定了《蒙特勒文件》，概述了私人保安公司和私人军事公司在武装冲突中从事经营的国际标准。²⁰更近的一项多方参与的倡议则是《私人保安服务提供者国际行为守则》，它旨在“澄清私人保安行业在复杂环境中从事经营的国际标准，并加强对这些公司的监督和问责”。²¹

商业道德的晚近演变

起初，在有关商业与冲突问题的讨论中占据压倒性地位的是对于“坏的大跨国公司”——它们孜孜以求一切能够到手之物，并为此进行一切必要的掩盖——的深度怀疑性分析。在其关于殖民地经济的重要调查中，戴维·菲尔德斯豪斯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何尤为负面地宣传跨国公司：他们将跨国公司视为征服外围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经济，使之依赖于一个其结构旨在迎合西方自我利益的核心全球经济。对这些“依赖”理论家而言，所有跨国公司都比早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西班牙征服者好不到哪儿去。他们认为

18 Mary Anderson, *Do No Harm: How Aid Can Support Peace or War*, Lynne Reiner, Boulder, 1999; Conflict Sensitivity Consortium, *Resource Pack on Conflict Sensitive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Peacebuilding*, available at: <http://www.conflictsensitivity.org/publications/conflict-sensitive-approaches-development-humanitarian-assistance-and-peacebuilding-res>.

19 See company websites at: www.g4s.com; <http://www.aegisworld.com>; <http://www.academi.com>.

20 The Montreux Document on Pertinent Legal Obligations and Good Practices for States Related to Operations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and Security Companies during Armed Conflict,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assets/files/other/icrc_002_0996.pdf.

21 关于这项由瑞士牵头的倡议的详细介绍， see http://www.icoc-psp.org/About_ICoC.html.

许多跨国公司仍然很乐意经营自己的私人军队或者代理人军。在尼日利亚的壳牌公司、在非洲南部的罗荷公司以及在巴布亚的力拓公司，都曾被视为这类不负责任的剥削性公司的典型，并且至今仍被一些非政府竞选运动团体如“伦敦采矿网络”如此看待。

在后殖民地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跨国公司”在左翼圈子里成了骂人的话。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变。公司社会责任的出现，加上许多全球性公司对商业伦理所作的深度重估，给非政府组织和公司带来了新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商业企业开始回应非政府组织批评者和股票市场立法者的道德敦促，并开始招募曾经的非政府组织活动家来管理其社交与供应链团队。非政府组织如公司观察组织(1996)开始监控单个公司的表现；涌现出一波新的资金，集中投向“对社会负责的投资”；联合国发起了“全球契约”倡议；股票市场也开发出道琼斯可持续指数(纽约，1999)和富时社会责任指数(伦敦，2001)这样的指数。这些进展大多是建立在非政府组织创新者约翰·埃尔金顿提出的“三底线”模型的基础之上。该模型要求公司就其对“人民、星球和利润”的影响作出报告。与此同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的主流发展理论也变得不那么“左”，更加赞同商业部门对人类发展与安全所作出的贡献。商业企业的人权义务也开始受到审视和阐述。这一进程的顶峰是人权理事会于2011年7月正式通过《联合国工商商业企业与人权问题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约翰·鲁杰教授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商业商业企业与人权问题特别代表期间，耗时数年精心准备的。

这一切发展都意味着商业考量与人道关切之间的藩篱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人道组织与工商商业企业一起辩论，都宣布尊重人权，越来越多地交换员工，并且共同实地参与制定有关社区发展和减少冲突的战略。

理解商业商业企业的多样性

正如有关商业商业企业与战争问题的早期争论将商业企业定型化为坏的大公司一样，它们还往往将讨论限定在采掘部门——石油、矿产和木材——和武器贸易。其他商业部门则受到忽视。还有一个事实也同样被模糊掉了，

那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穷人以及武装冲突中的大多数平民，都是这样或那样的小生意人。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的冲突性也已减弱，有了对武装冲突中的商业问题进行更深刻讨论的空间。已经有人对不同种类公司、不同商业部门以及各种不同商业模式作了有益的区分。这种对于商业商业企业多样性的更加现实的讨论，使得我们能够对不同类型的商业商业企业如何影响武装冲突以及如何受冲突影响进行更为细化的思考。

商业并非浑然一体。对于“商业”一词的恰当运用，必须涵盖在社会所有层面进行的大量不同形式的人类生产和交换活动。只有充分认识所有商业类型，才有可能充分理解商业商业企业与冲突之间的动态关系。不同商业形式之间的重要差异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要想同在任何武装冲突中都会存在的范围广泛的各类商业企业建立更好的工作关系并获得更多支持，人道机构必须懂得这些差异。

规模会在商业企业之间造成直接而显著的差异。市场范围也是如此——有地方性商业企业，有全国性商业企业，还有国际性商业企业。行业部门也会在商业企业之间造成差异，银行、零售、采矿、服务、农业、制造、建筑商业企业之间有着实实在在的不同。在内战经济中，对于武装部队而言，生产国际市场需求强劲的原材料的盈利性大型采矿商业企业多半要比服装零售连锁商业企业更具战略意义，因为这种时候当地人没什么钱来购买消费品。商业企业价值观也是一个区别因素。一些商业企业对于反腐败、反贿赂、员工待遇、高效率、良好的客户服务以及什么是道德上负责的产品和服务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另一些则不然。

所有权也会带来显著差异。商业企业可能是由一名或多名个人私人所有，也可能是通过千里之外的股票市场而为公众所有。还有些商业企业可能会采取互助或合作模式，即归所有成员和顾客所有。卫生、教育、食品和小微金融领域的社会商业企业家也越来越多地以“社会商业企业”而非非政府慈善组织的身份进行交易。“社会商业企业”这一术语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乡村银行创办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发明的，指的是那些通过商业经营来满足特定社会需求并将所有利润返回商业企业的公司。此外，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商业企业是国有的，尤其是在中国、非洲和南美。

商业模式也是造成商业企业间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像必和必拓或者斯特拉塔这样的大型高投资采矿商业企业常被称作“俘虏”商业企业。地理上，它们束缚在蕴藏自然资源的小片区域；财务上，它们受限于开采一个区域所需的数十亿美元的前期投资。它们还受限于时间，因为对高科技采掘商业企业的投资往往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获得显著回报。采矿商业企业的商业模式会带来很高的收益，但就业机会却相对很少。相反，软饮料和酿酒商业企业可能只需相对较少的前期投资，但却能通过遍及全国的营销网络，让数十万人为其销售产品。这给了它们真正亲穷人的、覆盖“金字塔底部”——大多数国家中数量最多、最为贫穷的那部分人口——的市场范围。一些行业部门如采矿业和银行业只有少数几家大型商业企业，因为极高的投资要求为进入市场设置了障碍。另一些部门如建筑业、农牧业和零售业则有成千上万的中小型商业企业。一些商业模式的季节性非常强。一些依赖出口，如经济作物；另一些依赖进口，如旅游（必须从国外吸引游客）。

一些商业企业在战争中适应性很强，甚至极具创新性。例如，在许多战争中，高端房地产、酒店和饭店市场蓬勃发展，因为它们适应情况变化，出租给国际援助机构使用。当津巴布韦的国际游猎旅行因为武装冲突而陷入停滞时，几家当地旅游公司转而向国际机构提供后勤和管理支持。瑞士最有名的巧克力之一“拉古萨”也是战时商业创新的产物。可可粉的供应在战时欧洲变得极为稀缺，卡米尔·布洛克转而投资于榛果并设计出这款成为其领导品牌的产品。²²

在对商业商业企业进行任何分析时，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之间的差异都是主要差异之一。一切经济都有正式和非正式部门，但受冲突影响的贫穷经济体有着尤为巨大的非正式部门。正式部门交税并受政府监管，非正式部门则不然。人道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同非正式经济打交道。武装冲突中的每个贫苦家庭都是某种形式的家庭商业企业，每天拼命为大人和小孩的劳力和产品寻找顾客，奋力保有或者拿回其财产。人道行动中通常所说的“谋生规划”或者“经济保护”，其实就是对家庭商业企业的支持。

²² Ragusa, 'Historique du produit', available at: <http://www.ragusa.ch/fr/historique-du-produit.html>.

商业企业在战争中的六种主要角色

着力强调商业是武装冲突和暴行的潜在动机，这是过分关注了商业企业作为冲突起因或者加害者这一潜在角色，而淡化了商业企业在战争中扮演的其他角色，即受害者、供应商、人道行动者、和平建设者和冲突预防者。除了意识到在武装冲突中从事经营的商业企业的不同类型外，人道工作者还需要细化地理解商业企业在战争中可能扮演的不同角色。最简单的办法是将这些角色归入下面将要讨论的六个主要领域。

商业企业作为加害者

国际人道法充分认识到商业企业在武装冲突中成为违法行为实施者的可能性。这一法律体系详细描述了这些在武装冲突期间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包括劫掠、制造非法武器、强迫劳动、公司所雇佣民兵的非法暴力行为，以及与国家或非国家部队相互勾结。公司可能直接实施这些犯罪，也可能成为其他实施者的共犯。²³

二战时期公司战争犯罪的一个里程碑案件是法本公司 (*I.G.Farben*) 案。法本公司是一家德国化工商业企业，其与纳粹当局合作，有计划地将纳粹占领国的化工厂据为己有，还向德国当局供应其拥有专利的奇克隆B毒气，在纳粹集中营使用。²⁴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的银行被证明曾共谋交易“纳粹黄金”，后者支撑着德国的战争行动，且往往是通过战争犯罪和暴行获得。大

23 关于战争罪中的公司共犯的全面讨论，se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Report of the Expert Legal Panel on Corporate Complicity in International Crime*, Geneva, 2010; and Sali Triparthi, 'Business in Armed Conflict Zones: How to Avoid Complicity and Comply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and Business, Geneva 2010, both 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ConflictPeacePortal/Issue/Complicity>.

24 Peter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I.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For the original judgment, see *US v. Carl Krauch et al. (I.G.Farben)*, US Military Tribunal sitting at Nuremberg, 30 July 1948 in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10*, Vol. VIII, 1952, pp. 1081-1210.

屠杀受害者的“金牙”和珠宝被做成金条，纳粹占领国的银行和个人的金块也被偷走。²⁵

晚近以来，非政府组织活动家们决心为战争中的公司犯罪确立当代先例。他们最为高调的行动之一，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指控安维尔采矿公司为刚果军队在基卢瓦屠杀100名平民的行为提供后勤支持。一家刚果刑事法院判决安维尔员工无罪，因为安维尔公司的车辆是被强行征用的。该案后来被人权活动家以集团诉讼形式诉至魁北克高等法院，但以管辖权不当为由被驳回，目前上诉到了加拿大最高法院。²⁶不过，全球见证组织的调查起初在2006年的一起个案中获得了成功。在该案中，荷兰商人古斯·考恩霍文因违反联合国对利比里亚的武器禁运而被一家荷兰法院判决入狱8年。²⁷

商业企业作为受害者

商业企业成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的时候要多得多。作为由平民员工组成的民用目标，商业企业备尝艰辛。在每场武装冲突中，大商业企业和中小商业企业都一样遭到攻击和抢掠。员工可能会被伤害、杀戮和强奸。他们可能会受到歧视，被草草解雇，并被敌方青睐的新员工取而代之。各种商业设施，从小货摊、公司仓库到大工厂，都经常在武装冲突中被摧毁。这种战争损害，加上市场进入、信贷、外汇和供应链方面的限制，往往导致商业企业破产或者大大压缩经营，从而意味着利润减少、工资降低、失业增多。

25 Jonathan Steinberg, *The Deutsche Bank and its Gold Transac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H. Beck, Munich, 1999.

26 Global Witness, 'Congolese victims' pursuit of justice against Canadian company goes to Supreme Court', 26 March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witness.org/library/congolese-victims%E2%80%99-pursuit-justice-against-canadian-company-goes-supreme-court>.

27 Global Witness, 'Arms dealer and timber trader Guus Kouwenhoven found guilty of breaking a UN arms embargo', 7 June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witness.org/fr/node/3569>. 考恩霍文和检方均对判决提起上诉。2008年，上诉法院宣判其在所有指控上均无罪，并予释放。检方再次上诉。2010年，最高法院将案件发回另一家上诉法院重审。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最近对查尔斯·泰勒的判决会否影响该案的最终判决，还有待观察。

商业企业作为供应商

如果商业企业在战争中幸免于难，它们常常会因为供应对战争行动或平民生存必不可少的商品和服务而生意兴隆。任何战争行动都需要为部队提供食品、报酬和装备，武器公司、建筑公司、食品公司和银行因此至关重要。同样地，许多大商业企业和小商业企业维持着对平民居民必不可少的市场。面包房保持着面包的供应，批发商、本地小生产商、零售商让人们能够继续买到各种各样的食品。对于遭受危险的平民居民来说，这些商业企业是必不可少的一线经济资源。它们的重要性现在已经得到人道机构的广泛认可，后者越来越多地采取基于市场进行项目规划、现金转移和货币化等受到“现金学习伙伴关系协会”²⁸推荐的做法。当地采购通常是人道行动的优先选项，因此当地商业企业往往会成为人道机构的主要供应商，维持着平民的生存。当地商业企业为人道援助经营卡车车队，生产坚果营养品 (Plumpy'nut)、²⁹塑料桶和通用名药物。

商业企业作为人道行动者

许多商业企业在战争期间不止作为人道机构的供应商，还直接成为人道行动者，领导着保护和援助平民居民的行动。商业企业为陷入危险的平民提供保护的经典例子是奥斯卡·辛德勒。大屠杀期间，这位德国工业家在他的搪瓷器和武器工厂雇佣犹太人，并向纳粹当局隐瞒他们的身份，拯救了1100名犹太人。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尚不足，但许多商业企业都有着在战争时期救助和保护员工、员工家人和当地居民的高尚历史。例如，在津巴布韦近年来的暴力政治冲突和经济瓦解期间，津巴布韦公司和国际公司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人道角色。当猖獗的通货膨胀让钱日益贬值时，它们用一篮蓝食物和必需品来给员工发薪，并确保退休金和寿险单以可能的最好方式得以兑现。即使

28 “现金学习伙伴关系协会”是一个机构联合会，鼓励采取以现金为基础的最佳应对方法。参见<http://www.cashlearning.org/english/home>。

29 Plumpy'nut is a widely used emergency food relief item, see: <http://www.nutriset.fr/en/product-range/produit-par-produit/plumpy-nut-ready-to-use-therapeutic-food-rutf.html>。

是在年度同比亏损严重之时，几家大型跨国银行和采矿公司如巴克莱和力拓也留了下来。这里固然有战略考虑的因素——维持积极的市场地位，等待好日子重返——但无疑也是因为董事们真诚地感到不能抛弃他们的员工及其家人，这些他们对其负有道德忠诚的人。

这类非正式的人道行动并未得到妥善记录，但大公司对人道行动的大型战略性承诺日益普遍。很多公司在实践中与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结成了人道伙伴关系，希望利用其在战争和灾难方面的专业知识。德国邮政与联合国的后勤伙伴关系、西门子与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联合会的合作，以及摩托罗拉国际关怀组织的联系，是这种商业—人道伙伴关系的三个例子。³⁰

商业企业作为和平建设者

商业企业在冲突中的第五个主要角色已经得到国际政策明确承认，那就是商业领袖及其投资对于和平建设和冲突后经济恢复所能做出的贡献。在冲突双方都拥有信任和交易网络的商业领袖，有时能够在和平建设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瑞士和平组织已经研究了在南非、塞浦路斯、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商业人士如何在交战各方之间斡旋进行早期和平谈判。³¹

“大钱”除了促成谈判，还能带来自身亲和平的新逻辑。运用双赢商业逻辑，围绕一份国际煤炭协定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来构建上位目标，这一做法帮助塑造了欧盟的雏形。散居各国的犹太富人投资者，以及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投资者，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南部苏丹、安哥拉、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等国寻找进行“第一推动”的商机。他们的投资为推动这些从持久内战中挣脱出来的国家恢复发展经济、强烈偏向和平做出了贡献。马诺卡普(Manocap)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这家位于西非的私募股权集团的两名创始人，之前曾以人道工作者的身份在塞拉里昂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目标组织工作。³²

30 See Andrea Binder and Jan Martin Witte, *Business Engagement in Humanitarian Relief: Key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HPG Background Paper, ODI, London, 2007.

31 Andrea Iff, Damiano Sguaitamatti, Rina M. Alluri and Daniel Kohler, *Money Makers as Peace Makers? Business Actors in Mediation Processe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 SwissPeace, Bern, 2010.

32 See Manocap's website at:<http://manocap.com/>.

商业企业与冲突预防

在和平时期，公司还可以发挥另一个重要作用，即致力于预防暴力冲突。作为其朝着负社会责任商业企业公民和有道德商业企业发展的努力的一部分，许多国内和国际商业企业都在自身商业经营中尽量限制冲突升级风险。同人道机构一样，它们也尽量“不造成损害”并降低冲突风险。

今天，做有道德的好商业企业意味着要确保你的商业企业在任何经营环节——供应链、招工政策、工作条件、同本地居民打交道的方式、使用警卫和保安部队来保护商业企业设施的方式——都不会造成或维持武装冲突和侵犯人权行为。这种冲突预防在道德上是好事，对商业企业也显然是有好处的。商业企业需要警惕经营环境中的政治不稳定情形，避免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发生的灾难性的声誉损害。现在很多商业企业都已认识到，商业利益与道德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愉快的联系。³³

现在所有主要商业部门——包括采掘业、制造业、银行业和旅游业——都有范围广泛的国际行业标准，为预防和减少冲突提供最佳做法指南。新的《联合国工商商业企业与人权问题指导原则》代表着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国际框架，旨在确保所有商业企业对其商业活动进行各种“人权尽职调查”，以防止或救济与商业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³⁴

多家采掘业公司，如力拓、英美、必和必拓、纽蒙特和巴里克（约翰·鲁杰最近刚被任命为其特别顾问），在致力于同矿山周围的本地社区形成公平、和平关系的自身行动过程中，都正在采纳冲突解决、和平建设和人权监控的理论和实践。这方面最为进步的一些例子是由力拓在澳大利亚领头进行的。³⁵现在，力拓正尝试在几内亚和秘鲁这样的国家、在武装冲突刚刚过去不久的更加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冲突解决工作，因为其深深意识到，采矿在这些国家仍有可能成为武装冲突的导火索。

33 HavinaDashwood, *The Rise of Globa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Mining and the Spread of Global Nor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2.

34 UN Guidelin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Documents/UNGuidingPrinciples> (last visited 23 Sep 2012).

35 Bruce Harvey and Simon Nish, 'Rio Tinto and Indigenous Agreement Making in Australia', in *Journal of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 Law*, Vol. 23, No. 4, 2005, University of Dundee.

这种对冲突解决方法的采用受到许多非政府和平组织的明确鼓励，如国际警信协会——该组织一直热心于展示负责任的商业企业在缓解紧张关系和建设和平方面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吕克·赞德夫列特和玛丽·安德森运用其在“不造成损害”的项目规划方面的人道经验进行研究，撰写了一篇关于减少冲突和建设和平的新的实用文章，现在正被采矿商业企业广泛使用。最近在秘鲁和南非的大规模示威和死亡，表明我们离成功尚有一段距离，并暗示采矿在21世纪仍有可能是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让商业企业成为人道行动的常规组成部分

人道机构已经频繁证明，它们在处理与武装冲突中不同主体的关系方面具有创造性和适应性。笔者希望，对商业企业在武装冲突中的多种不同角色和利益的更加丰富和细化的认识，将会给人道机构与商业企业的关系带来重要的新发展。积极地同商业企业在武装冲突中的几种角色打交道，这有望给人道行动的内容带来一些重大创新。为此，人道工作者需要将各级商业人士（中小商业企业和大商业企业）作为武装冲突中的常规对话者加以接触。

与此同时，四个主要方面的人道政策也许能够最有效地增进与商业企业界的人道接触。

商业企业与人道法

同各级商业企业进行更多接触应当成为更加广泛地传播国际人道法律和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开展的介绍和宣传活动可以通过本地商会、贸易协会、行业最佳做法团体、股票交易所、工会以及广泛的印刷和广播商业媒体，将不同的商业社群作为目标。人道宣传活动更好地瞄准商业企业，将使商业人士更清晰得多地了解其在人道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这使得他们能够很清楚地预期到自己作为加害者所将面临的追诉、作为受害者所能获得的人道支持和保护，以及作为人道行动者所能发挥的作用。

为商业企业受害者代言

人道需求评估可以更详细得多地评估和报告具体商业企业和市场在武装冲突期间所遭受的损失。让国际社会更加充分地意识到商业企业遭受的确切损失——被破坏的自然资源、工厂、财产、市场和办公室，被杀害或因此失业的员工——将有助于吸引人们关注商业企业损失对于平民居民的重大影响，并促进根据国际人道法对商业企业进行的保护。

保护商业企业存续

人道援助可以探索创造性地制定援助计划，在武装冲突期间支持商业企业的有积极意义的存续。需要部署新形式的人道援助，支持那些作为必不可少的供应商和有重要价值的雇主、能够对范围广泛的平民居民的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商业企业存续下去。工作重点可以放在受冲突影响经济体的中小商业企业和不稳定的中间层(或所谓中观层)上。

为一个被战争蹂躏的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支持之一，也许就是防止其商业企业破产。信贷支持、资产保护、市场进入、外汇支持以及重新进货和缩减储量这些已经在微观层面有效适用于小土地所有者和个体商人的项目，可以扩大到中观层面，使小商业企业保持对脆弱平民的雇佣和供应。这一层面的商业企业救援包括临时性购买资产以保持其生产能力，或者防止资产被贱卖给成群结队的投机者。它还可能意味着让那些依赖于食品原料或机器设备的关键进口的商业企业能够进行外汇交易。这种商业企业救援有助于维持就业，并有助于向如此众多的受冲突影响的贫困社会中所谓“消失的中间层”供应救命的商品。

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商业企业救援活动都能为瞄准平民个人的传统做法增加实实在在的价值，促进以商业企业为基础的人道行动创新。支持商业企业存续可以成为战争之中和之后的更加广泛的复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商业人士参与

在迄今为止的许多人道机构中，商业人士对人道行动最常见的参与方式都是作为资助者——出钱出物。这种将他们作为“捐赠者”的简单想法限制

了他们对于制定人道计划所能作出的贡献，也模糊了对商业企业作为战场上的受害者的认识。让本地商业人士更好地参与到战场人道需求评估和规划工作中，将有助于更加充分地认识和理解战争经济、其对平民造成的损害，及其进行更新或调整来过完漫长冲突的潜力。

商业企业作为新的人道利益攸关者

同一群全新的商界利益攸关者和对话者在战争中打交道，这样的前景可能会让本就被武装冲突中形形色色的规划议程弄得身心紧张的人道工作者们望而生畏。事实上，人道工作者们为了同另外两个可能具有道德模糊性的群体——政治当局和武装部队——进行有原则的合作已然费尽心力。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再同商业企业积极接触，似乎并不明智。然而，武装冲突总是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提供公正援助和保护这一人道使命也必须预期涵盖每一类利益攸关者。如上所述，人道学者和活动家在过去20年间已经发现了商业与武装冲突之间的重要联系。应当运用这一知识来使平民居民受益，并像商业人士爱说的那样，用足它的价值。